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传承理路与价值禀赋

王雪莹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7；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品格，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立场。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文化根脉，用好中华传统美德资源，推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创新，对培养公民道德价值观念、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鉴于此，通过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内在关联性，明晰其根脉相通、实践贯通、内核融通的逻辑向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伦理特质和价值魅力，为新时代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凝聚强大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价值与传承

DOI：10.64216/3104-9672.25.04.04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弘扬，要先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逻辑关联与价值禀赋，让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注入思想力量。

1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传承理路

明体方可达用，执一始能驭万。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展现出广泛之“用”。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核融通，根脉相通，实践贯通。

1.1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内核融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一以贯之地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内容体系、核心观点进行继承与创新。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同构性，二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中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内驱。中国古代的“仁爱”、“民本”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情怀意旨；“诚

信者，天下之结也”“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国人民人际交往乃至中华民族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存而不忘亡”“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在大动荡、大变局中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文明以止”的理性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探索人类现代文明新样态的精神动力，等等。

1.2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根脉相通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春秋初期，管仲提出决定国家兴衰的四重维度：“礼、义、廉、耻”，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写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将“仁、义、礼、智”四个要素归纳总结出来，作为道德的基本规范。汉代，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思想家董仲舒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增加了“信”的元素，他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官方地将“仁义礼智信”作为评价道德的五大基本要素。公元79年（汉建初四年），在白虎观会议上，正式将“仁义礼智信”作为明确内容记载下来。此后，评价道德修养有据可依，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而不断丰富其内涵与规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不是自中国步入文明社会才出现的产物，早在原始社会炎黄时期，炎帝

“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奠定了西周的礼乐宗教文化和传统美德。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同根同源，二者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如“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评价标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修身处世之道，民贵君轻的朴素民本思想，“汜可小康”的大同精神等，都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方法论指导。

1.3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实践贯通

从实践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凸显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道德准则、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内容耦合并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道德基础并规定其发展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反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发展要求并受到其制约。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中所蕴含的家国观念，道德理念，人格信念引领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提供了行为准则与价值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2]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华夏子孙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实践中形成的，其中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反映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意识，将维护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渴望世界和平，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安定局面；倡导重义轻利，重视培养公民道德修养，提升个人道德境界；注重个人与社会、国家、世界整体目标的高度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展现了各民族乃至全世界思想文化“百花齐放”，彼此交流、交融、碰撞的图景。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呈现出的发展性特点有助于其更全面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更充分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理念深入人心，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得到有效提

炼和传播，使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更为密切，进而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两个结合”赋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各民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背景下创造光辉夺目的新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化底蕴。

2 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价值禀赋

随着“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如何在新历史语境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生命力，成为至关重要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传承实践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主体理论与行动指南，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传承”以及“以何传承”的核心问题，具体可以从核心价值、实践价值与时代价值三个维度进行阐发。

2.1 核心价值：确立“守正创新”的根本传承原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基于“守正不迷失、创新不僵化”的元理论原则与方法论基石，它超越了简单的“古为今用”，提供了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关系的科学框架。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之“魂”筑牢传承之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辩证法武器。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传统美德形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对其中的历史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另一方面，更要善于提炼其中具有跨越时空价值的伦理精华。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传统美德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确保新时代文化发展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前进。其次，以文化主体性之“根”固守传承之本。传承必须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日益深入的今天，构建美德传承体系，必须坚守这一主体性。这意味着传承工作要主动基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当代实践，塑造自身的道德话语体系与文明形态。最后，以“两创”方法论之“要”激发传承之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处理传统文化问题的核心方法论。它要求传承必须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这种方法论指引确保了传统美德持续融

入现代生活、回应时代课题的活态文化基因,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2.2 实践价值:构建“三维一体”的系统传承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将抽象的美德理念转化为日常化的具体方案,它承继并发展了中华文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进阶智慧,推动构建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国家大德三维一体、协同共进的传承格局。在个人层面,滋养品德修养,激发道德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它推动深入挖掘“讲仁爱”、“守诚信”等传统个人品德资源的时代内涵。这一过程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构建立体化培育体系,旨在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社会层面,维系和谐秩序,培育公共精神。针对现代社会人际交往复杂化、公共领域扩大的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阐发“崇正义”、“尚和合”等传统社会公德的现代治理价值。“崇正义”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尚和合”所倡导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理念,则是处理社会矛盾、协调多元利益、促进社区和谐的价值润滑剂。国家层面,熔铸民族精神,彰显国家大德。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传统美德的传承,提升至熔铸民族魂、彰显国家德性的战略高度。它创造性转化了“重民本”、“求大同”等传统政治伦理。“重民本”思想融入当代治国理政实践,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爱民、利民、惠民。“求大同”的社会理想,则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贯通,并在外交实践中具体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使得传统美德的传承超越了单纯的道

德建设范畴,成为凝聚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形象、参与全球伦理治理的深层精神力量。

3 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双向互动,伦理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更是“一部推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百年奋斗史”。^[4]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弘扬,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开放包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新的历史,创造中华文化新样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指导,以重塑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以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蓝图,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使命所在,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殷切期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人民日报, 2017-10-28.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4] 王文东, 李伟. 中国共产党推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04): 5-12.

作者简介: 王雪莹(2001.5-), 女, 汉族, 山西临汾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